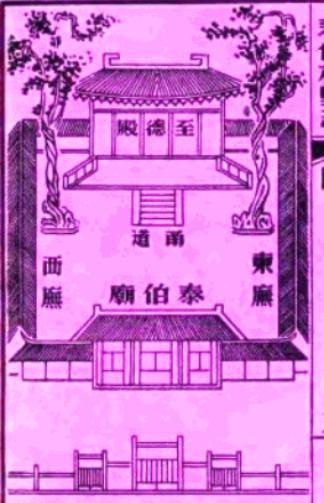


無錫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目 录

不用眼泪和花圈的纪念

怀念叔父孙冶方 薛禹平 (1)

有关泾皋女校之回忆 顾谷同 (9)

一家三博士 胡 琦 (14)

追念堵一烈士

..... 徐月娥口述 堵仲伟整理 (20)

华绎之及其祖父华鸿模生平传略

..... 华敦礼 (30)

为我国电讯事业作出贡献的陶凤山

..... 张 鸿 俞景明 (35)

名中医曹清华医德事迹

..... 范钰堂 严文朴 (38)

刻碑名手黄怀觉 郑逸梅 (41)

附记 黄稚圭 (47)

- 太平军在无锡 强济和 (49)
开化乡蚕农与洋商的一场斗争
..... 沈克明 (57)
辛亥革命时期的横山寺同盟会
..... 周达人 萧彦忠 (60)
日本侵略者在东亭乡的暴行... 华振范 (64)
- 匡仲谋与匡村中学 (续)
..... 匡锡麟 匡泉海 管墨林 (68)
陈伯瑜创办怀仁中学 陈宝鸿 (84)
怀念我中学时代的校长陈伯瑜
..... 周永嘉 (93)
- 无锡县茧行业简况 许德镇 (98)
鸿昌祥米厂四十年概况 吴志诚 (103)
关于无锡县碾米业的一点补充
..... 周鉴宏 (108)
- 从薛福成谈人口危机说起 叶劲秋 (110)

祇陀寺..... 华振范 (115)

无锡县特产

本县乡镇传统风味拾零..... 陆桂根 (120)

阳山水蜜桃..... 孙介良 (123)

不用眼泪和花圈的纪念

怀念叔父孙治方

薛禹平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孙治方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年了。

孙治方原名薛萼果，是我的叔父，老家在无锡县玉祁乡，一九〇八年九月三十日出生在一个小职员家庭里。叔父在一九二三年就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无锡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他十五岁就从事革命活动。在他革命生涯的六十年里，经历了坎坷曲折的道路。他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而奋斗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晚辈更好地学习和工作。

叔父在十七岁时就离开家门。一九二五年，受党的派遣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东方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俄文翻译。三十年代初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以后就参加江苏、广东等地农村经济调查，抗战爆发，又在上海广泛发动各界爱国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又辗转重庆、苏北，并在华中局宣传部和党校工作多年。解放以后，叔父随军南下去上海接收工作时，我们才和他见面。以后虽曾多次回锡，但在家中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直到一九七五年，叔父从狱中出来不久，他拖着多病之躯，才回到无锡的老家。由于受长达七年另五天的监狱生活

的折磨，他多病体弱，双手颤抖，撑着拐杖还是步履艰难，我们全家都难过得满眶眼泪。那时“四人帮”还在横行，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六口只住在十二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屋里。叔父说：“我这次回家不住招待所，要住在家里。”我们都很高兴，同邻居周家商量，临时借个房间，就让叔父、婶母住在那里。叔父回家后当天，要我去无锡市委，代他报个到。他说：“不要别人说我孙冶方是逃回来的。”去报到之后，那个时候的市委领导也没有一个人来问过讯。一个为党的革命事业奔走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共产党员，第一次回家探亲，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在一间小屋子里默默无闻地住了一个多月。三中全会以后的一九七九年，叔父来无锡开会时，他还特地去周家道谢。

叔父回无锡老家后，除了看书写文章外，经常要我陪他出外串街走巷，去看看他的母校连元街小学，和他当年经常去借书的“县立图书馆”，还有年轻时常与青年们聚会碰头的城中公园以及他的出生地玉祁乡。叔父喜欢步行，手拿拐杖，旧地重游，兴致很高。我看到他如此的遭遇感到十分痛心，曾劝他告老还乡，对他说：“我赡养你终生”（我叔父结婚后，没有子女）。他说：“我不能为了不吃苦而放弃自己追求的东西，今后我还是要回北京去的。”

叔父的个人生活，历来是严于律己，重视党性的修养。虽受到过多次的错误批判和打击，但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不计较个人恩怨。他艰苦朴素，从不搞特殊化，就在一九七五年他回家休息时，我陪他下乡到梅村、玉祁、洛社等地去调查，虽然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走路离不开手中的拐杖，但他坚持同一个普通老百姓一样挤坐公共汽车和轮船。一九七九年叔父来无锡开会，我爱人见他大衣里面穿的是一件有补丁

的旧卡其布衣服，一定要去手工业商场给他买一件新衣服，他忙摇头说：“我几十年从不进百货商店，生活上我没有任何要求。”我到北京后，他知道我没有吃过窝窝头，特地关照阿姨做窝窝头给我吃。他说：“我关在牢里，天天吃窝窝头，你这个无锡人也要尝尝。”在他一生的生活中，没有特殊化，也不讲究待遇，他把自己的几万元稿费交给组织和他的生前友好，表示自愿捐献给国家，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用于奖励有最优秀的论文或著作的中青年经济科学研究人员。几十年来，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不向组织提什么要求，也从不为自己的家属和亲友开什么方便之门，一九八一年，我在北京，叔父为我出车去地坛出国人员服务部提取电视机，回来后，他坚持要司机代他去单位付汽油费。他一生中极力反对不正之风。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好品德。

叔父一生是勤奋好学的。他精通俄语、日语和英语。他出狱后，又开始攻读德文。一九七五年回无锡时，虽已是六十七岁高龄，但还攻学德文，他到公园里坐在石凳上，也抓紧时间学习，有一次我陪他到玉祁乡，在轮船里，他同一些乘客闲谈一回后，就默默地背诵德文单词。我问他为什么还要学德文？他说：“学好了德文，就能看懂原著，能更好地理解原著。”他北京家里书房两侧都是书橱，排得整整齐齐，里面的书籍一般都夹着书签，并做好标记。叔父学习认真，有着深厚的理论修养，但从不摆权威的架子，家里客人不断，他总是满腔热情，百问不厌，平等待人。在平时，除了接待客人外，整天就在书房里系统地读书。

叔父孙冶方，在经济理论上，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记得在一九七五年的某一天，我陪着他从农村考察回

来，叔侄俩步行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他：“报上点名批判你，说你是鼓吹利润挂帅，是修正主义，究竟为什么？”他说：“一九六三年我在内部写了三篇未发表的报告，康生和陈伯达就告了我的状。”他又说：“我提出，为社会主义创造利润，有什么不好？社会主义利润和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有什么错呢！现在许多工厂不计成本，不讲价值规律，还有些企业靠国家救济过日子，这样下去，怎么了得！”由于叔父坚持真理，康生根据他的讲话和未发表的研究报告，将他打成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对他进行围攻，但他从不屈服，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叔父还说：“在理论上康生没有使我屈服。”后来，我叔父又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于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康生亲自下令将他关进监牢。他们为了怕我叔父与外界联系，秘密地把他关在北京西北部秦城监狱中的单身牢房里。几年来，不准与家里通讯，通电话，信息全无。由于他长期患肝病，在狱中的生活，折磨得他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但是他决心为真理活下去，每天吃窝窝头咸菜，细嚼慢咽，吸取其中仅有的一点营养，换取热量，以维持自己的生命。在狱中他穿的黑衣、黑裤，连裤带也不给。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搏斗，坚信黑暗终将被光明代替，为继续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战斗。在狱中他仍然坚持阅读马列原著，前后共通读四遍《资本论》。他曾说：“我对照原著，越感到自己是正确的，决不是修正主义。”因而更加增强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为了针对“左”倾的错误，他决心写一本《社会主义经济论》的书。一九七五年四月十日他被释放出狱，一路上，在汽车里对工宣队长说：“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观点。”的确，我叔父不说假话，不拿原则作交易，不顾个人

安危，勇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后来，我去北京叔父家中，看到他写给中央的一份揭露康生的材料，这时我才知道，康生一伙阴谋家，早年在莫斯科时，就伙同王明一起残酷迫害过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当年叔父在莫斯科“中大”学习期间，曾积极参加和支持党员群众反对王明的家长制统治（当时四百多名党员中，赞成王明路线的只有二十八人，一人弃权，这就是后来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正由于此，他遭到了康生一伙的长期迫害。但多年来，他坚持真理，不畏反动权势，不顾个人安危，勇于同一切错误作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我叔父很注意系统地读书，讲究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实践为标准，反对教条主义。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刘少奇同志平反前几天，王光美同志送来三张少奇同志事迹预展参观券，叔父知道我就要出国，就陪我去革命历史博物馆，他向我介绍了少奇同志生平事迹，并指着少奇同志写的《答宋亮同志》这封信。他回顾当年在华中党校教授马列著作时，当时有些干部以大老粗为光荣，不重视理论学习，看不起知识分子，许多同志认为，只要有了实际斗争经验，不要高深的理论也能领导好革命。他们轻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因此，他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少奇同志，当天少奇同志作了肯定的答复，阐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写了三千多字的回信，这就是有名的《答宋亮同志》（宋亮是当时孙治方的笔名）。

叔父不仅是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个模范共产党员，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对共产主义信念坚定不移，不论遇到多么大的恶风险浪，永远鼓舞和支持他一生不停地进行战斗。他在病中，尤其在他临终前，还与病魔顽强地搏斗，忘我地写完他的最后一篇经济论文，就是发表在八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的那篇经济论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证而且有技术经济保证》，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同，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采纳了他的主张。

叔父动了大手术后又活了三年半时间，连医院里的大夫都讲，这是个奇迹。他战胜疾病的意志坚强到令人惊异的程度。自从一九七九年九月因肝癌动手术后，长期住院，但他从不考虑自己的病情，惦念的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曾多次去医院看他，病房里客人一批批不断，组织上还专门为他做了一张床桌，使他能坐在病床上写作。在他住院三年另五个月中，他不停地工作，夜以继日，起草和整理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若干理论问题》，三本约七十万字的巨著。他还写了二十三篇经济论文和两篇文艺评论，还有党史资料等。记得在一九八二年四月，我第三次回国休假，我们夫妇俩去看望他时，他正在伏案写关于电影《天云山传奇》的评论。据说，当时某些人对这部电影横加指责，波及整个社会，他十分激动，问我看过没有？我说在国外没有看到。他要我多看几遍。有一天下午，见他打电话给张光年同志，说打算写一篇《也评天云山传奇》的评论文章。当时，我看到他身体不好，劝他不要去评文艺界的事了。但劝说无效，他坚持要写，婶母和我都没有办法。他说，今后我们再不能重犯“把同志当做敌人的错误了”。后来，这篇文章发表了，博得文艺界的一致好评。

我叔父在肝病发作时，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但他从不呻吟。在十二大期间，我去北京叔父家里，当时他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他的精神仍很兴奋，强支着身体参加会议。

会议结束后，我接他回家，他的身体已不能支持，脸色苍白，我扶他在躺椅上休息。我知道他的病情已恶化，通过组织了解到他的癌细胞已扩散了，心想我此次出国，今后恐怕见不到他的面了。叔父怕我不想走，会议期间打电话给我，再三叮嘱，不能为了他的身体而影响援外工作，问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走（原计划是九月四日的飞机）？我含着泪在电话里告诉他，因过境护照没有办好，要推迟十四天，下一趟班机才能走。十四天后，那天去飞机场前，我握着叔父的手，泪水充满了我的眼眶。但他说：“我的身体不要紧，再过一年你回国还能见面。”想不到，他的病情急剧恶化，就在我离家的第二天，他就第四次住院，也是最后一次住院。这次的分别竟成了我们叔侄的永别。

我叔父在病中渴望着祖国美好的未来。当他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织授于他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时，他笑着说：“我为党做的工作还很不够，希望把病治好后，再多做几年工作。”尽管已经病危，但是他仍然强烈地要求活下去，病魔从来没有压服他。在他逝世前组织上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他写了《我的遗言》交给组织。他的遗言是这样写的：“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希望用眼泪和花圈来纪念我。”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五时零五分，叔父在他漫长曲折的人生道路上，燃烧了七十五年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他的一生始终和我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紧紧地拧在一起，他是一个高尚圣洁的共产党员。他热爱祖国，他追求生活中的真、善、美。在停放他遗体的北京医院厅堂里，没有哀乐，只有贝多芬的《英雄颂交响乐》的旋律。他的骨灰已

撒在故乡太湖之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其名”。他的精神永远留在人间。

我的遗言

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作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判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偏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地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此致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会

北京医院党委

我的老伴洪克平家属

孙冶方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有关泾皋女校之回忆

顾谷同

编者按：

顾谷同先生系我县张泾乡人，是我国电气工程界著名老前辈，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顾老今年已八十三岁高龄，仍不辞辛苦，为我县文史资料撰文，在此表示感谢。

清光绪末，始兴新学。上海招商局创建南洋公学，在江浙颇有影响。无锡靠近上海，开发较早，亦先后办了东林学堂、埃实学堂、竞志女校等。我一九〇二年生于无锡县怀上市张泾桥镇。在我记事之年，镇上已有一所泾皋学堂，由顾氏义庄办的。教室即在义庄后进，玻璃窗户，天井亦颇宽畅，教室后有操场。学堂原只招收男生。我堂兄曾于是校就读，堂姐年小，亦允于附读。课程有国文、算学、历史，舆地、体育等。国文读《古文观止》、《左传》、《四书》等。估算泾皋学堂兴办约在一九〇三年。我一九〇七年入学时，已改为泾皋小学，有少数女学生。记得有谢树材、顾谷嘉（上海五四中学前校长）。

辛亥革命不久，受革命和男女平等思想影响，族人顾彬生、伯父顾霭人和镇上有识之士共同倡议兴办女学。我这时

大约读四年级，是时小学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三年。我因病读了六年初小，故估计女校成立在一九一二年。

兴办女校之部分经费由义庄提供。校舍就在西街我故宅“黑墙门”内。前后两厅做教室，后厅东侧厢房是办公室和教员宿舍。我母亲蒋士梅任第一任校长，是义务任职。教员则从多方延聘。记得泾皋小学校长辛柏生，国文教员荡口人须从周都在女校兼课。应聘来女校上课的，还有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生本镇人华昭复，雪埝桥人薛毅，上海务本女校毕业生瞿某等。城中竞志女校有一个教员，每周乘船下乡来教美术和手工课。有音乐课，无体育课。教室不敷应用，采取复式开班。学生大多是镇上的，也有江阴长泾、北润来的。因顾及年长未上学的女子，许多学生年龄较大。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品行端正。如今能记得当年女校学生中，有以后曾任泾皋中学校长的李进化，泾浜蚕种场的顾梅云，还有谢树屏（现已退休，曾任上海某中学校长），顾谷定。

泾皋女校在苏南农村是创建较早的女校。办学上因地制宜，招生上为年长的女子提供就学机会，课程上也应承了当时社会需要，如蒋士梅就教过刺绣。这在当时都有些革新的含义。

泾皋女校创建后约三年，学生增多，迁到顾氏义庄。泾皋小学则设在顾氏祠堂内。此时女校成为怀上市市办的正式学校，校名全称为“泾皋女子高等小学”，用新教育的正规课程。近处各乡镇都有女学生来就读，少数还可寄宿。迁校后校长仍是蒋士梅，后因病辞去职务，由顾彬生之侄女顾艺菊接任。后又聘请苏州女子师范毕业生顾谷绥当校长。此时女校在操场北侧增建了一排教室，办得很正规。无锡十七市乡，顾彬生是怀上市督学；无锡县教育局长钱孙卿，对女校

颇多支持。后顾谷绥去城中县女中任校长（约一九二二年秋）。约在一九二三年泾皋女子高等小学同私立泾皋小学合并为公立泾皋小学。以后泾皋小学又与县立第五高等小学合并，迁往东街河南去了。

回想当年故镇子弟，生活虽然清苦，但读书求学，自成风气，至今印象犹深。我今年八十有三，女校往事，虽可依稀回忆，但诸多情节恐难免记错，盼了解的同志予以核实补充。

一九八五年四月

下面的《新校舍落成记》及《女子宜革除陋习说》两篇文章，是当时泾皋女校国文课教材，由国文教员张遄喜所撰并教授，原无标点符号（由张泾乡供销社孙同元同志收集）。

——编者

新校舍落成记

张 遄 喜

泾里为怀上巨镇，是镇以顾氏为大族。顾氏有义庄一所，良田千亩，积资钜万。族之贤者，以息胤繁盛，不可有失教养。爰于前清末叶，以庄款创女学于庄内，设男校于祠中。上继端文讲学之风，下励地方向学之意。至今垂二十年，学子众多，故有庄舍不敷应用，又值学制改变，两校有

并合之计。族人以前效已著，后业是宏，乃复集议增建新舍于旧址之北，广事培植。兴工于民国十一年冬，越年落成。是年秋，男校迁入。至是升阶而观：池通西舍之流，窗映东邻之桑，岩峣高敞，规制井然。同学欣然色喜谓：杨柳摇风，梧桐生雾，获此宏构，益足畅襟胸于无极也。况在二三知友，坐对芳月，静听虫声，时哉！世人每谓读书乐，读书诚乐事。但不知较我泾皋学生为何如？又不知我泾皋学生其亦能乐其所乐，而毋忘其乐否？（七月十八日记）

女子宜革除陋习说

张道喜

尝谓女子之美当在德，而不在形。宜以德而正形，不可以形而毁德。种种陋习，尤非吾纯洁女子之所当有。德可修而致，形美非能力求也。何以言之？昔汉有孟光者，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梁鸿妻之，后世以为贤。越之西施病心而颦，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效其颦，其丑益甚。晋有妬妇段氏，刘伯玉妻也，伯玉诵洛神赋曰：嫗妇如此，吾无憾矣！妇即沉渊死为水神。其后有妇人渡此津者，皆衣坏粧然后敢济，不尔，即风波暴发矣。观此则东施之不能为西子，犹紫之不能乱朱。而孟光之独以德称，段妇之以妬死，贤与不贤犹泾渭之流，清浊自分也。乃愚者不察，舍此不为，必欲效法东施，衣绮缟，傅粉墨，眉远山而脸芙蓉，腰杨柳而胸玉壶，足则莲步生花，耳则瑤珰映月，含芬芳，佩容臭，望之烨然如神人，美艳极矣。顾使与肥黑之孟光相

对，不知当谁先掩其形容以塞嗤笑也。然则效颦若此，何如效贤。孟光修容之丑，何如修德之美乎！此予之所以谓德可修而致、形美非能力求也。嗟乎！吾女子以美人一念之误，遂致木偶其形，而奴隶其性。人以玩物视我，而我且亦以玩物自居。天地间，可耻事孰有甚于此者。从今以后，不知吾纯洁高尚之女子，视之其亦能稍感于心，耻其所耻，而知所以革之否耶？